

論魯迅在廣州

广东鲁迅研究小组编



目 录

DD23 / 3

- 鲁迅思想的飞跃与“妄想的破灭” 吴宏聪 (1)
- 读《答有恒先生》及其他
- 试论鲁迅在广州期间的思想特征 廖子东 (16)
- 广州“四·一五”事变前后的
- 鲁迅思想 陈则光 (44)
- 论鲁迅在广州时期的思想发展 陈安湖 (93)
- 读《而已集》 袁良骏 (134)
- 兼论鲁迅世界观的
 转变问题
- 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俞元桂 (164)
- 兼谈鲁迅思想的质变
- 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柳尚彭 (181)
- 读《野草·题辞》
- 论一九二七年鲁迅思想“变迁的径路” 刘焜煐 (194)
-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
- 鲁迅思想 彭树鑫 (219)
- 略述一九二七年鲁迅思想的发展 张 竞 (237)

鲁迅在广州时期的思想新发展	余振钢	劳鸿锴	(270)
略谈鲁迅进化论思想在广州的轰毁	黄荣新		(282)
鲁迅战斗在广州	许涤新		(298)
鲁迅在广州的战斗历程	李惠贞		(315)
从文艺思想看鲁迅世界观的转变	张建业		(332)
鲁迅与广州新文艺运动	戚俊民		(350)
闪烁着唯物主义光辉的文艺批评思想	严承章		(383)
——读《魏晋风度及文章			
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在广州前后的教育思想	曹思彬		(393)
鲁迅在广州阅读革命报刊与学习			
马列主义初探	李江		(407)
追随时代，战取光明	伍肃		(443)
——鲁迅在广州走过的道路			
给我们的启示			
鲁迅在广州与党的关系	陈子典		(475)
鲁迅在广州的若干问题	李育中		(498)
浅见琐谈	郑心伶		(524)

通事受贿，和尚被焚的故事出自何书………江 立 (548)

——鲁迅《而已集》注释

杂谈之一

鲁迅在广州知用中学演讲《读书杂谈》

的几个问题……………谭汉钩 (552)

编 后 记……………编 者 (557)

封面题字……………商承祚

封面设计……………齐爱华

鲁迅思想的飞跃与“妄想的破灭”

——读《答有恒先生》及其他

吴 宏 聪

鲁迅在广州的时间并不长，对他战斗的一生和思想的发展却至关重要，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但是具体分析这个时期鲁迅思想的发展时，仍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我认为这个问题，鲁迅在一些文章中已作了很多的回答，例如收在《而已集》中的《答有恒先生》就是一篇触及时事，联系实际，进行自我解剖，叙述他在广州这段时间思想发展的实录。只要我们把他在这个时期发表的著作和革命实际联系起来认真加以分析和研究，就不难得出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鲁迅沉默了几个月，没有公开发表文章，九月三日开始写了一篇《通信》，九

月四日接着写了《答有恒先生》。这篇文章最值得重视的地方是他第一次公开宣告他的一种“妄想的破灭”，痛切地感到他以前写的许多文章并没有给读者指出一条真正的出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帮助别人安排吃人的筵宴，成了做“醉虾”的帮手。因此，时至今日，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他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上面一些形象的比喻，显然是愤激之词。但毫无疑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改变了他以前认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的看法，发现“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发现，使他感到无比的震惊。他在《三闲集·序言》里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一九二七年他“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他的“思路因此轰毁。”

什么叫“妄想的破灭”？什么是思路的“轰毁”？我认为，说法不同，指的实是一回事。即表明他的思想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血的教训，起了根本的变化，核心就是进化论对他的思想影响问题。

大家都知道，进化论被称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化论风靡一时，不仅严复等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把达尔文学说奉为圭臬，就连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鲁迅都相信进化论。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

不是有一段文章说他“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吗？鲁迅后来回忆他早年所受的进化论影响时还说，“进化论对我还是有帮助的，究竟指示了一条路。明白自然淘汰，相信生存斗争，相信进步，总比不明白不相信好些。就只不知道人类是有阶级斗争。”^①但对同一学说，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甚至同一个人，前后的表现也判若两人。翻译《天演论》而名噪一时的严复，晚年竟后悔自己以前出版《天演论》时，立论过猛，就是实例。恩格斯在给拉甫洛夫的信中说：“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同意发展的理论，至于达尔文的证明方法（生存竞争，自然淘汰）我认为只是被发现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全的表现。”鲁迅正是抓住了这个“发展的理论”，从进化论中得到唯物地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提出了将来必胜于过去，新的必胜于旧的，青年必胜于老人的观点。从《答有恒先生》和《三闲集·序言》的文章来看，一种“妄想的破灭”，“思路因此轰毁”，更多的是针对青年必胜于老人这点来说的。不过，由于鲁迅对进化论曾经作过这样的表述：“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②很容易引起人们对“新陈代谢”的某些误解，忽视新陈代谢也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因此在分析“妄想的破灭”与“思路因此轰毁”是否表明他

此时已经扬弃了进化论这个牵涉到鲁迅世界观转变的问题时，产生种种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不联系上下文，不“顾及全人全篇”，抓住《答有恒先生》最后第三段中“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几句话，便强调鲁迅对群众的看法还是唯心主义。有的文章根据他的购书账目，断定一九二八年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进行有关革命文学论战时才接触马列的书，言下之意，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血的教训，鲁迅思想并没有起什么根本变化，从而否认鲁迅思想在这个时期有了新的飞跃，这当然是不符合鲁迅思想发展的实际的。有的文章甚至说鲁迅在一九二七年前不曾认真研究过马列主义，只因为一九二八年受了创造社的“批评”才开始研究起来，那更是荒谬绝伦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蒋介石阴谋篡夺北伐胜利果实的一次历史事件，在这之前发生过一九二六年底蒋介石在南昌、安庆惨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的“惨案”，在这之后还有广州的“四·一五”“清党”和“七·一五”宁汉分裂后的反革命屠杀。“四·一二”是历史事件的概念，我们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血的教训，实际上是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的教训，它给鲁迅的震动比辛亥革命失败强烈得多。思想飞跃是说思想发展由量变到质变，即通常说的到了由“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关节点”，并不意味思想发展已经到了“顶点”，也不是说鲁迅在这个时期已经熟练地掌握和运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不能把鲁迅当做“神”，也不能用“神”的要求来要求鲁迅。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有起伏、有曲折，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不能设想鲁迅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什么问题都看得很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经过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血的教训，他已经摆脱了进化论的桎梏，摆脱了唯心史观的羁绊，思想上有了新的飞跃。

此外，关于鲁迅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也要实事求是。我们当然不能说廿年代初期他接触过《共产党宣言》，便认为鲁迅很早便具有共产主义思想，他大量阅读马列著作是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事，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九二七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对他的思想影响。从文艺方面的情况来看，他对于当时苏联文艺斗争、文艺政策都有一定的了解。有两篇文章很值得注意：一篇是一九二五年写的《〈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另一篇是一九二六年写的《〈十二个〉后记》。《〈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是共产党人任国桢辑译的一本有关十月革命后苏俄文艺论战的书，共收了四篇文章，其中一篇是《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鲁迅除了替这本书校订、联系出版外，他在《前记》中特别介绍《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一篇“是用Marxism于文艺的研究的。”《〈十二个〉后记》最突出的是后记一开头就指出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算不得一个大风暴，到了十月，才是一个大风暴，怒吼着、

震荡着，枯朽的都拉杂崩坏，……”尽管《十二个》作者不是新兴的革命诗人，而《十二个》“正是俄国十月革命‘时代的最重要的作品’”。这些见解极为中肯，不熟悉苏联文坛情况，没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是写不出来的。这并不象一些同志所说的那样，鲁迅是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系统地学习了马列，思想认识才有这样的变化。至于一九二七年广东地区党组织派党员毕磊、徐文雅等人与鲁迅联系，并赠送《少年先锋》、《做什么》，给了鲁迅巨大的启发和力量，其影响就更加明显了。

二

我完全同意鲁迅思想发展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后发生了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的看法。但我不赞成具体分析鲁迅世界观转变这个问题的时候，把鲁迅学习马列主义与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割裂开来。鲁迅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从厦门来广州的动机原想“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③照我个人肤浅的看法，鲁迅来到广东，与党发生了接触，进一步读到了马列的书，这对他思想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但就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后的思想发展作一全面

考察，当时激烈地进行的革命斗争对他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在《三闲集·序言》里他就明明白白地说他在广东思想发生变化并非受“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作品的蛊惑”，而是“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这里，我们没有丝毫忽视马列主义对鲁迅思想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恰恰相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来考察这个问题，我们倒认为“四·一二”前夕，鲁迅转引列宁的话来立论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就是他运用马列主义来作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代表作。这篇文章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对马列主义明确的态度，表明了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鲁迅已经有意识地“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了。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鲁迅思想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飞跃。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最引人注目的是鲁迅引述了列宁下列一段话：“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这段话见斯大林《论列宁》一文，鲁迅从中共广东区委捡送给他的《少年先锋》中转引全文作为自己分析形势的武器。据斯大林《论列宁》一文说，列宁上述那段话是一九〇七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讲的。列宁针对

自由资产阶级妄想领导农民运动的企图和孟什维克妄图取消社会民主工党而把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融化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的错误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批评，坚持了工人阶级政党对工会实行思想上、政治上的全面领导。代表大会以布尔什维克对孟什维克的胜利而结束。在这情况下，有些代表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孟什维克从此完蛋了”。列宁的上述教导，就是针对当时某些代表因胜利产生骄傲情绪而提出的警告。

关于列宁这段教导的来历，鲁迅是否了解，我们无法确定。但鲁迅据此立论，运用列宁总结的经验来观察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分析当时中国革命的现状，意义是极其重大的。有的文章，虽然肯定这篇佚文的意义，也承认“四·一二”前后是鲁迅思想由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关节点”，但又认为马列主义的因素在当时鲁迅整个思想中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这个观点，既没有回答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后鲁迅思想是否有了飞跃，又似乎给人一种印象，仿佛这个时期进化论仍对鲁迅思想起主导作用。

事实上，鲁迅前期的思想比较复杂，除进化论以外，外国的尼采、叔本华，中国的庄周、韩非等人的学说，对他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承认“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随便”、“峻急”并不说明鲁迅前期思想的实质，但我们不能因为鲁迅讲过“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

的”一句话，就把问题讲死了。就拿进化论来说，鲁迅虽然相信进化论，同时又是极其严厉地批判庸俗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启蒙思想家。鲁迅把进化论作为战斗武器的时候，便觉察到真正理解达尔文“进化”两字含义的人并不多，正如他在《人之历史》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近日，进化之语，几成常言，喜新者凭以丽其辞，而笃故者则病侪人于猕猴，辄沮遏以全力。”此外，还有些人把生物学规律搬用到社会现象的领域中，断言只有“强者”和“适者”才能在斗争中生存下来，而弱者只有灭亡，明目张胆地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开脱。因此，他愤怒地指斥那种“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的侵略者为“兽性爱国之士”，一针见血地戳穿了以强凌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动实质。这一事实，不仅说明了鲁迅对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了解，比当时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高明得多，而且显示了鲁迅坚持战斗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不把进化论当作教条，终于在他找到了真正的科学思想以后，救正了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三

当然，鲁迅扬弃进化论的思想绝不是偶然的。我们认为要研究鲁迅在广东的思想飞跃，必须把他在这个时期写的文

章和以后追忆他在一九二七年的思想活动的文章，联系当时革命斗争的实际，进行一番考察。因为鲁迅是在广州亲眼看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如何被国民党反动派夺去了胜利果实，亲眼看到了蒋介石如何穷凶极恶地屠杀人民，而革命阵营又如何在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中激烈分化的。通过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四·一五”血的教训，鲁迅才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思想上有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比较突出的是：

第一是看到了“红中夹白”、“奉旨革命”的种种现象和广东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的危机，对当时急遽变化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有了清醒的认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东工农群众运动迅猛发展，“国民革命军”镇压了盘踞在广东省内的地方军阀的叛乱后，于一九二六年开始北伐，广东被称为革命的策源地。鲁迅初到广州，看到这里的民情“比别处活泼得多”，“前几年在北方，常常看见压迫党人，看见捕杀青年”，到了广州，“都看不见了。”但随后他就发现这里的一切“还是旧的”，广东依旧“是军入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为什么鲁迅来到广东不久便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显示了如此深邃的洞察力？主要的原因是他参加了革命斗争的实践。鲁迅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就认为“在实际社会变革的斗争中是没有旁观者的地

位的”，他自己“并不是一个旁观者。”他写的《黄花节的杂感》和《革命时代的文学》等文都有鲜明的针对性，处处显得他不是旁观者。在黄埔军校讲演中他特别赞扬实地的革命战争。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鲁迅在《野草·题辞》中这样写道：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尽烧
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这是鲁迅把自己的战斗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自白，使我们看到他是如何推动自己的思想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第二是运用对立统一矛盾转化的辩证规律，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所谓“革命已经成功”的欺骗宣传，鲜明地揭示了“革命无止境”这一真理。他告诉人们：“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⑤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在庆祝胜利凯歌声中提出了“永远进击”的口号。强调在胜利的条件下，不能忘却进击，对敌斗争必须坚持不懈，不能“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使敌人得以“乘隙而起”，“卷土重来”。鲁迅用辛

亥革命克复南京的种种联想和记忆犹新的血的教训，提出了如何对待革命战争的胜利和警惕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阵营进行破坏，避免重犯辛亥革命历史上的错误的警告。可是就在他提出这个警告的两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遭到了失败。预见成为事实，说明他按列宁的教导把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上升到马列主义的理论高度，思想上有了新的发展。

有的同志不认为鲁迅上述的认识已经达到了马列主义的高度，他总结的经验教训符合客观的真理性，实际上是忽视了鲁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和他到广州后的革命实践，低估了马列主义对鲁迅的思想影响。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⑥鲁迅后来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曾不无感慨地说过：“其实是我所指摘，现在都已由事实来证明的了，我那时不过说得略早几天而已。”⑦这不就是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么？

第三是吸取了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经验教训，对文艺与革命关系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鲁迅早期对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是有他自己的看法的，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间写的有关文章中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如日本厨川白

村的理论)和苏联无产阶级理论对他都有一定的影响，但还不能很好阐明文艺与革命的辩证关系。到了一九二七年他对被称为“同路人”的苏联作家如叶遂宁、梭波里的生活道路就作了极为中肯的概括。鲁迅曾多次引用叶遂宁、梭波里的例子，说他们开头是如何的欢迎十月革命，但对十月革命一无所知，结果出现在他眼前的“却是老老实实的革命”，于是“空想被击碎了，他就活不下去了。”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他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首先具有革命的立场，提出了“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人做出来的东西才是革命文学”，“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解放，然后才有平民文学”的看法。在《革命文学》中他还以“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的形象的比喻，阐明了“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的观点。这里谈的就不但是文艺与革命的关系而是作家的世界观改造的问题了。诚然，《革命时代的文学》这篇文章有些地方，未必精当，但当时能有这种独特的见解，不能不说这是思想上一个跃进。作为一个作家，鲁迅的文艺观是他的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鲁迅文艺观的形成过程，来研究鲁迅思想的发展是不无意义的。

第四是进行自我解剖，找出了自己思想上的“真症候”。关于这一点，《答有恒先生》中讲得很清楚，不必多费笔墨。什么叫自我解剖？自我解剖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来总结自己的思想，检查自己的社会实践，揭示思想